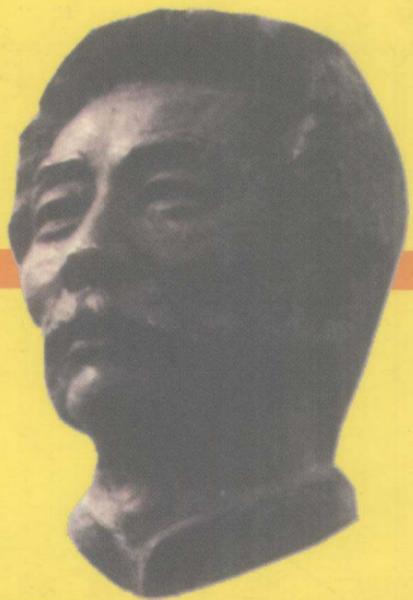


广·东·鲁·迅·研·究·丛·书



鲁迅的 当代意义

广东鲁迅研究学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鲁迅的 当代意义

广东鲁迅研究学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的当代意义 / 广东鲁迅研究会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10
(广东鲁迅研究丛书)
ISBN 7-218-04145-0

I . 鲁... II . 广... III . 鲁迅 (1881 ~
1936) —人物研究 IV.KI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6699 号

责任编辑	何燕屏
责任技编	孔洁贞
责任校对	吴荆子
封面设计	刘晓菁 杨白子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1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4145-0/K·851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 83790067 83791084

李尔重

发扬鲁迅“直面人生”的精神（代序）

研究鲁迅是个世纪性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一切忠于人民的精神，都是国际主义的。国内研究鲁迅的机构很多，除了像广东鲁迅研究学会这样的专门机构外，还有许多团体在研究。这是可喜可贺的。

鲁迅为什么值得中外如此认真地研究？这是鲁迅创造的历史和业绩所造成的。我今年八十八岁了，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受鲁迅思想影响很大。我从十七八岁到二十多岁，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鲁迅的。郭沫若、蒋光慈的也读，对我也有一些作用，但给我教育最大、印象最深刻、促我始终向前的是鲁迅。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五四前后他就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危险处境。当权者的腐败，袁世凯的卖国等等，鲁迅恨之入骨，他已经认识到不把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打倒，中国就没有希望，中华民族就没有希望。他当时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呐喊》和《彷徨》。其中的《一件小事》就表现了鲁迅

作为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他通过一个人力车夫的形象展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暗示着革命必须依靠人民大众。这两部作品指出这一时期主要任务是把封建王朝余孽清除掉，至于如何清除他们，他也还没弄明白，只有“呐喊”和“彷徨”。这时的鲁迅是旧民主主义的鲁迅。

上世纪 30 年代，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鲁迅进一步研究如何求得民族解放这个问题，在《二心集》、《华盖集》里集中表现了他对这方面的思考。鲁迅在上世纪 20 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创造社对他进行围攻的时候，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这样的阅读使他将好些过去看不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看明白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见之于他对 30 年代革命青年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坚决支持中。在杨杏佛被刺后，鲁迅勇敢地参加了追悼会；刘和珍牺牲后鲁迅撰文悼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烈士被害后鲁迅极度愤慨并撰写纪念文章。同时鲁迅还对反革命、汉奸和卖国贼进行口诛笔伐，他骂汪精卫是“玩笑旦”（我国戏剧中卖笑、瞎扯、媚俗的角色）。另外，鲁迅还同周扬、徐懋庸他们就文艺的性质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周扬他们当时对扩大统一战线的意义认识比较模糊，他们提倡国防文学，团结面较小，而鲁迅极力主张人民大众的文学，坚持文艺的平民化。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我受鲁迅的影响归结起来也就是他提出的“直面人生”。现代术语就叫实事求是。一个人说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如何如何是不能算数的。只有面对历史的现实，从心里把你真实的人生目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内涵说出来，并且要与人民群众同步实践，这才是直面人生。

1932 年上半年，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讲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主要矛头指向那些跟着有势力、有权力的人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 PDF 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话、顺风倒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演讲尖锐地批评了这种现象。如《大公报》是“小骂大帮忙”的一套。“新月派”、“象牙塔派”等流派一部分就是直截了当地跟着国民政府骂群众，这就是所谓的“帮忙”文学。另一部分干脆沉湎于风花雪月和男女情爱之中，文章充溢着闲情逸致，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要有悠闲性和刺激性，“漂一族”。这一类就是帮闲文学。“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就是徐志摩，他的文字很美，但是他的豆腐块跟人民求解放有什么关系呢？鲁迅公开为革命烈士伸张正义。直面人生是鲁迅留给我们建立正确人生观的出发点。

现在思想如此混乱，对待腐败你持什么态度？第一是要承认这是祸国殃民的，第二是要问自己如何对待、如何处理。鲁迅说“我的确时常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喊共产主义万岁是容易的，难点在于终生不辍实践到底，把信念化为行动。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它告诉我们要正视现实，用正确的历史观处理问题而不是迎风走、顺风倒。

回顾我国的历史，司马迁比扬雄、司马相如在品质上要高一个境界。他写《史记》，把刘邦、项羽和秦始皇一起写到“本纪”，可见他给败者以同等的地位。而孔子当时并没有汉武帝抬得那么高，司马迁把孔子放在“世家”里，最后称他为“圣人”，实际那是曲笔。司马迁批评儒家“博而寡约”。他的真实想法是对老子思想评价很高。在《太史公自序》里他谈到自己写《史记》的指导思想就是“述往事，知来者”。要正确地认识历史，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分清哪是精华，哪是糟粕。我们的古书都是儒家做的笺、注，其中存在歪曲或伪造。举个简单的例子：襄公 29 年，吴季札聘鲁已见诸《诗》之《风》、《雅》、《颂》，那时孔子才 8 岁，他怎么可能删《诗》、《书》订礼乐？大儒们不会不知道这个事实，但为了尊孔、护儒，他们

故意掩过了这一常识。

扬雄为了捧王莽做了篇非常漂亮的文章《剧秦美新》，就是为了把王莽捧舒服了自己有大官做。司马相如死前写了“封祥书”，也是为皇帝歌功颂德。可见“帮忙文学”、“帮闲文学”自古就有，而且承传不断。“二为”方针提出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鲁迅讲了，也做到了。你要做这个事情，就必须批判有碍于这种事情的东西。不敢和歪门邪道做斗争，还要说自己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那是假的。

鲁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觉得可以从他的《自题小像》“我以我血荐轩辕”来把握。他坚持有益的事情我做，有害的事情我一概不做，做错了我改。有了这点精神，在文学造诣上就可以得到升华。鲁迅在学术研究上也下了大功夫，《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纲要》，他没有像郑振铎那样引用很多材料，但他能画龙点睛。他做出的精练的评价对后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我们现在好些文学史没有把庄子和列子当成重要的文艺思想资源，但鲁迅从文艺的角度对这些思想有着审美的深邃的看法。他的看法和章太炎、闻一多先生的看法一致。所谓的古文是针对白话文说的，古文并不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说的那个意思。古文在当时就是白话，拿到现代来才演变成了、过时了。所以那些东西我们只能从当时是白话的看法来加以研究，不能因为它现在不好懂就把它看得玄之又玄。历史上也有些为了迎合儒家思想而故意进行删改的，如武王伐纣，在《书经·武成》里写有“血流漂杵”。“血流漂杵”当然是杀人甚多，人民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所以《武成》里没有这句话，《孟子》删去了“血流漂杵”，加上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就显得武王以有道伐无道，大得人心了。《论语》里孔子说：“凤易不来，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哉！”司马迁改为“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从此便有了河图、洛书之说。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还不少。鲁迅搞《嵇康集》的校对，就是要核实文记显现嵇康不媚俗，中流砥柱的精神。

鲁迅不但直面现实，而且研究古代中国文化。我们现在说的大量成语许多是古人传下来的，这些语言在现代仍然有生命力。人民群众日日时时在创作精辟的语言。有出息的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学习和运用古代与现代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语言，才能创作出生动活泼、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诗经》90%是人民的歌谣，屈原的作品大量地引用了古代民间的传说，魏巍、刘白羽、柳青等当代作家大量地吸收了现代人民的语言。鲁迅先生的作品，吸收了丰富的古今人的精粹语言。他们创作的是传世不朽的作品，大有益于人民与社会主义的作品。我的老乡张爱玲的作品则是意识流的典型，她还蔑视仇视人民大众，在她的世界里不存在人民，只有她自己。她信笔挥来写吃饭、睡觉、唱歌、拉屎、穿衣、观花……她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怎样写就怎样写。她心中只有她。她的作品也只能为“她在”服务，与人民是无关的。

我们今天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就是要学他拿出做人的勇气，直面人生，看别人、看历史、看自己的韧气和劲气。

目 录

发扬鲁迅“直面人生”的精神（代序）	李尔重	(1)
“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		
——鲁迅对我国现代价值观的开拓与追求	黄新康	(1)
鲁迅杂感的意义	邓国伟	(14)
“速朽”与“不朽”		
——鲁迅的生命版本与魔力	郑心伶	(23)
鲁迅改革国民性思想新探	王福湘	(32)
鲁迅的当代接受	向卫国	(44)
鲁迅研究的曲折及其发展前景	胡子明	(58)
非议鲁迅现象的文化透视	巫小黎	(72)
鲁迅“立人”思想的深远意义	张 竞	(80)
从“网上鲁迅”看民间的鲁迅	陈艳冰	(92)
要成为“现代人”和“世界人”	应向东	(102)
胡适、鲁迅、周作人文学价值观浅析	魏 星	(109)
再论“走近真实的鲁迅”	王祚庆	(122)

2 鲁迅的当代意义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

- 重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吴宏聪 (129)

追求的背面

- 重读《伤逝》 姚玳玫 (138)

心灵、自我与性别文化批判

- 《伤逝》、《祝福》解读 西 篱 (152)

《狂人日记》启示录 袁盛勇 (161)

试论“孤独者”魏连殳的“复仇”悲剧 邓 聪 (173)

重读《祝福》 吴炳钊 (181)

语言的先驱

- 试论鲁迅的白话诗对后新诗潮诗人的影响 晓 音 (192)

鲁迅与新世纪汉语诗歌 陈元胜 (197)

鲁迅赴港讲演始末考 李伟江 (217)

立人：鲁迅的当代意义（代跋） 编 者 (245)

黄新康

“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

——鲁迅对我国现代价值观的开拓与追求

意识、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与时代总是相呼应的。因此，当社会、历史孕育、蓄积着一系列急剧的改革变迁，社会的阶级结构、政治形势、生活方式等等都表现出必须“重建”的特征，那么，其人文精神、思想观念、价值体系等等，也必然会在反抗、背叛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找新的文化精神的生长点，会在与旧的意识形态决裂中，寻找新的意识形态破土而出的契机，以支持、助长社会的“重建”。

19世纪后期开始在中国所呈现的改朝换代式的“重建”，也需要新的人文精神、思想意识、价值体系的“重建”，尤其需要有一种新的、代表历史的先觉声音的价值观，去“解构”、“颠覆”旧的伦理理性，去“摧毁”、“消解”旧的礼教网络，以促使人们的人的意识的觉醒、生命意识的觉醒、个性意识的觉醒，从而在冲决价值信仰系统与政治权力系统高度合一的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帮助中国社会向现代方向转型的深化、

展开。

然而，从中国大地上吹起维新与改良之风以来，虽然时代在要求变革，政治在要求变革，舆论也要求变革，借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的话来说，便是：在“欲新一国之民”、“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欲新人心”、“欲新人格”等等的时代要求刺激下，于维新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许多著述中，读者虽常常可以感受到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弃旧图新、幡然思变的慷慨悲歌式的灵魂的呼喊，有些文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呈现出把人的自觉与民族的自觉结合起来，把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结合起来的鲜明特色，可惜却十分遗憾地缺失了饱含着最现代的气息，奔突着最现代的精神，体现出主体意识的最高层次和根本核心，极大地关注个体的命运、尊严和价值，以解读、诠释个人、个体的意义和作用为旨归的个人本位价值观。这一缺失，对中国社会由封建专制向民主、自由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可能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其影响将是极为不利的。众所周知，由血缘家庭所派生出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以儒学孔教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的价值信仰系统，以及集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宗教为一体的生活图式，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剥夺尽净人的主体个性意识，对每一个人均按某种社会契约进行角色的指认与定位，并运用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道德的等软硬兼施的手段，从自主感、现实感、生命感、身份感等各个方面，使个人完完全全地丧失掉“自我”。在这种情况下，缺少以人学研究所探寻出来的最高层次和最新的核心成果——个人本位价值观，去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价值信仰系统，进行“解构”、“颠覆”、“摧毁”和“消解”，哪能使生活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熟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惊醒起来？又哪能使被束缚在“家族”制度的结实牢笼中、被挤压在“群体”的浓

重暗影下的个人，还原为有着独立自在的意义，有着天赋的价值和尊严，能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勃发着个性的魅力与自我的人格力量，不依附、不从属、不仰息于社会和“群体”的自我呢？

世界性的时代的潮流，既已把个人本位价值观推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和着力点，而我国的维新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竟对此不置一辞，这不免使鲁迅感到非常失望了。面对这一缺失，鲁迅自己只好筚路蓝缕地开垦中国的这块处女地了。1907至1908年，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重要论文中，他一方面热切地呼唤“不和众嚣，独具我见”，“洞瞩幽隐，……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的“精神界之战士”、“英哲”、“超人”能在神州大地上迅速涌现；另一方面，则以强烈的敢于正视现实、改造现实的生命冲动，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在现实生活中因所经受的毫无个人的位置、价值和尊严而产生的悲剧感、幻灭感、紧迫感，以及敢于冒华夏天下先的过人的魄力和胆识，大声疾呼地喊出了充满“血的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①：

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文化偏至论》

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

——《破恶声论》

^① 《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以下所引版本相同），第397页。

不仅如此，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还明确地宣示：

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信，即造物主。

还说：

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

这就是说：人必须发挥自己的个性，然后才能摆脱精神世界的束缚；只有这种自己的个性，才是创造世界的主人；自由是依靠力量才能争取得到的，而力量就在个人身上，这就是个人的财富，也就是个人的权利。

如此肯定个人的尊严、个性的价值，如此阐释个人、个性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的永恒的、无限的活力和巨大作用，其狂放不羁的雄姿，其桀骜恣肆的气质，其所具有的震撼力和冲击力，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它使沿袭了几千年的以礼教和家族制度为核心的严密完整的价值体系，出现了一个性质突变的新的“范式”，将封建时代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全套的信仰、价值、观念、标准、规范、通则……，引入一个从旧的变成新的、古典的变成现代的崭新界域，从而促使中国人在惊醒、反思、告别并更新传统中，为“现代中国”登上历史舞台作了价值观方面的准备，或者说用新的价值观在思想意识上为“现代中国”催生。

不是么？请看中国人在漫长的专制时代里所遭受的非“人”的待遇。

在世界各国中，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性思潮，是最先最早在神州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的。先秦以前的六经所论及的人生立身的问题和人们行为的规范，暂且不说，仅从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所涉及的人生观、人性观、社会观、伦理观、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的繁富内容来看，就足以说明：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人”所建构的形形色色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理论形态，便已学派纷呈，门户林立。此后，这类探讨绵延不绝，从未停止。可惜，这并没有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带来运气，相反，却被套上枷锁，扣上镣铐。因为，历代的“圣人”和“圣人”的徒子徒孙们所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讨的“人”，其学说、其主张，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大都不包含感性的，个体的，有着活跃的生命和创造力的，既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有独立的人格，有自主性、自觉性、能动性和选择性，有丰富情感，有种种愿望，有多样需求的“孤独”的“人”，而只是群体的“人”或人的群体，是联系中的“人”或人相互之间的联系；他们所关注的，只是社会人，而不理睬自然人；他们所津津乐道的“人性”，也仅仅局限于其社会属性，而排斥掉它的自然属性。于是蔑视人的个人的尊严，抹煞人的个性的价值，便自然而然地成了这些学说、理论的出发点，也成了它们的终极目的。所谓“克己复礼”，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已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其心思和立意。

然而，中国人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远远不只如此，他们还要受政治原则的钳制，伦理原则的钳制。

在专制的宗法社会里，人文学说是不许与政治割裂分离的。维持好上下、尊卑、贵贱、主奴等伦常关系，是天下大治、久安不乱的基础，是社会稳定有序、易于驾驭的前提。所以，世世代代的权势者以及他们所豢养所御用的文人，不仅运

用各种手段，在他们所设定、所画出的框架之内，对个人进行抑制和整合，以便为自己塑造“理想”的顺民，而且还从教化的立场出发，总是用尽心思、绞尽脑汁地把人文学说，提升到政治的高度，转化为实际政治形态，或称官方意识形态，甚至转化为实际政治体制，以普遍性形式和不许甄别、质疑的姿态，来规范、制约、统一人们的思想，来束缚、规定和限制人们的行为。倘若有谁对人事世情，未能忘却与冷淡，敢于取思想通脱的姿态，以人的主体地位和个人独立价值的理念为依据，发出异端的声音，甚至斗胆说出人人有权产生自己的思想，甄别别人的思想，而不是只被动地接受别人的理论、思想、见解、主张……这类极其合乎天赋人权的肺腑之言，手握权柄的统治者，便会以安定国家、保护民生的藉口，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明明暗暗，软硬硬地进行口诛笔伐，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来统一文化政策，划一思想舆论。因为，在他们看来，凡是对正统文化、思想、道德、意识等等具有异己力量的自发性内容，都是至为危险的东西，是不利于把个人整合在他们的模式之中的，所以必须扑灭。历史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清王朝的“文字狱”、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围剿”，便是掌权者用政治原则导演出来的历史上著名的闹剧和悲剧。

自由的实现，有赖于个人的真正的自立和对个人的自在权威的确认；民主的树立，有赖于对个人的普遍尊重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解除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束缚，让每一个人都能在社会活动、日常生活等领域，不是由权力的抑制整合，而是以自由契约的形式，轻松洒脱地前行。惟其如此，个人才会有一个可以独立思考的空间，个人才能保有他该有的尊严；也惟其如此，个人的才华才能得以施展，个人的价值才能得以实现。而专制产物的政治原则，却使个体生命与精神层面的个人空间，

被完全取消了，主体的个性意识，被彻底剥夺了。个性被践踏得片甲不留的结果是：每一个个人仅仅成为长官意志或某种社会契约的角色指认。真是可悲而又可怜！

人为了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在主体的能动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必然会不断丰富和发展种种自然性的、社会性的，物质的、精神的，个体的、集团的，阶级的、民族的，享受的、发展的，自我的、为他的，劳动的、休息的，知识的、交往的等等不同结构和层次的需要。与此相适应，也必然会派生出不同的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态度、人生道路、人生责任、人生价值和生死观、义利观、公私观、苦乐观、荣辱观、美丑观、情谊观、自由观等等不同的看法和信念，来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于生命的意义，应追求怎样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料想的并将一生为之奋斗的向往目标及所希冀的美好彼岸，将是怎样的生活理想、事业理想和人格理想？”等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除了通过国家机关，在政治、法律、规章、制度等方面强行制定和强制执行许多强制性的手段之外，还得从道德的层面设置“底线”和“边线”，作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以约束人的行为，调整人的社会关系，保证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得到维持和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靠社会舆论的力量，依靠人们的信念、习俗、信仰、情感、传统等形式，进行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行为、道德评价的传播和灌输，是正当的，必需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既然道德规范的设立，是为了人的“自我保存和自我更新”，那么，评价和判断某种道德意识、道德规范，是应当的还是不应当的，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善的还是恶的，是美的还是丑的，其客观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看它是否有利